

# 论近代初期我国普通中学历史课程设置

陈 辉

作为一门向后代进行教育的内容——历史课程在中国起源很早。魏晋南北朝以前,历史课程并不是单独设置,而是和文学、经学联系在一起,即所谓“文史不分”、“六经皆史”。魏晋以后,历史才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中,历史课程占有相当的份量。辽、金、元等少数民族当权者,亦特别重视历史课程。明朝规定,国史学必设“史学”课程。清代书院也规定学生需学“史学”,作日记,由学长评阅指点。然而,历史作为学校的一门课程,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从近代实行新的教育制度开始的。具体说来,我国近代普通中学历史课程的研究首先涉及的就是洋务学堂和维新学堂的历史课程设置。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 一、近代洋务学堂的历史课程

19世纪60至90年代,是洋务派活动时期。这30年间,伴随中国社会极其深刻的变化,中国人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他们看到了机器生产的优越性,也认识到某些新思想、新文化是可取的。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为加强封建政权,应付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力图调整步伐,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本着“变器不变道”的原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提倡“西学”。他们认为,“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所以应该“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sup>①</sup>。因此,“精熟西文”,学习西方人所擅长的“测算之学,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通晓“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sup>②</sup>,也就是说,企图改变传统教育专事经文的陈旧内容,增强自然科学知识。他们欣赏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认为“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sup>③</sup>。加之,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以后,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洋务派痛感外交、军事、生产技术人才缺乏,为了所谓“自强”、“求富”,就必须仿照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兴办新式学堂以培养人才,以解决外交、军事、生产技术人员缺乏问题。李鸿章曾说,要想使中国“自强”、“求富”,“肄习西学,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当务之急”<sup>④</sup>。由此可见,洋务派把育人才作为创办新式学堂的目的和任务。

基于以上要求,洋务派便仿效西方,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相继开办了外语、水师、武备、电报、医学等新式学堂。洋务新式学堂的创办是中国新教育的萌芽,开中国近代新教育之风,是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在中国实施的先声,为中国以后的新学制奠定了基础,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开端,因而具有重要影响和历史意义。

洋务学堂的历史课程可分为三种不同类型。

第一类,外国语文学堂,以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湖北自强学堂为代表。

京师同文馆是于1862年,由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办,它是我国最早的一所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不仅仅是一所外国语学校,同时也是一所具有近代意义的官办学校。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从1869年继任总教习后,建立了新的课程,拟了两份课程表,其中一份“由洋文而及诸人”的“八年制课程表”,规定第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sup>⑤</sup>由此可见,同文馆开始设置了地理、历史课程。值得注意的是,同文馆的地理、历史课程是“专习世界史地”<sup>⑥</sup>。“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sup>⑦</sup>,足见外国史地课程的设置是清政府外交的需要。因为同文馆学生中的一些人在当时的外交活动中,常常充当译员,参与外事活动。后来,肄业于同文馆的学生担任外交使节,肩负着外交重任。例如,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斌椿前往各国考察,就有同文馆学生凤义、德明、彦慧三人为译员。再如,同治八年(1869年)以美国公使蒲安臣为首组成的出使欧美使团,访问欧美各国,就有同文馆学生六名充当译员。这些充当译员或随团出使的同文馆学生通过外国史课程的学习,对增长其阅历,了解外国的实情,确有益处。所以,同文馆外国史课程的设置为中国培养并训练外交人才起了一定的作用,也为中国人民放眼观察世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开了一个良好的端倪。

同文馆的外国历史课程由外籍教习用外语授课。同文馆条规规定:“馆中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可兼习别艺”。“学习洋文、洋语限以一年为期”<sup>⑧</sup>,学生在学好洋文、洋语的基础上,再任意挑选一门课程。外国史课程内容在“读各国史略”的基础上,由教习“随习体察,酌量变通”<sup>⑨</sup>。外籍教习用外语讲授历史,这在历史课程史上,还是第一次。

同文馆的课程标准还规定,历史课程的学习需与翻译西方书籍紧密结合起来。按规定,从第三年开始,练习译书是外国史课的必修科目,学生译书有成就的,均有奖励。当时,俄文馆学生译有《俄国史略》(History of Russia),杨枢、长秀译有《各国史略》(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sup>⑩</sup>。学生在翻译外国史的过程中,不但增长了历史知识,熟悉了各国情形,而且提高了外语能力。这种外语课程与历史课程紧密结合的课程模式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先进的,值得借鉴。

总之,同文馆是继教会学校后中国官办洋务学堂第一次设置外国史课程<sup>⑪</sup>,对以后废书院、兴学堂,建立和实施“癸卯学制”的历史课程具有重大影响。

上海广方言馆于1863年在上海成立,它是一所仿同文馆之例由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设立的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其性质是为通商督抚衙门及海关监督部门培养承办洋务人才的翻译馆。有了这些人才,“关税军需,可期核实,而无赖通事亦敛迹矣。”<sup>⑫</sup>广方言馆所学课程以外国语为主,兼学经学、史学、算学、词章四门,除外国语由英国教习用外语授课外,其余四门课程由中国教习承担。中国教习是从品学兼优的内地贡生员中选拔的。

《计呈酌拟广方言馆课程十条》规定:“诸生有志读史,务宜心精力果,罔有作辍,一日之中,限以定程,细心玩读二十页,约计三年,即可卒業”<sup>⑬</sup>。这就是说,历史课程的学习要循序渐进,切勿中途而废。中国史先读《通鉴》,再读《通鉴外纪》、《续通鉴》及《明鉴》、《明纪》;再听教习讲解《读史论略》,做到“熟读无忘”、“全史在期”、“得其要领”<sup>⑭</sup>;最后再听教习续讲《读史方輿纪要形势论略》一卷及选刻《列史记传》,并以王船山《读通鉴》三十卷为参考。这样安排历史课程非“侈言淹博”,而是要学生“事事体认,取法于古,以增长其识力”<sup>⑮</sup>。这是当时广方言馆学习中国史的目的。

到广方言馆末期,在设置中国史课的基础上,又增设外国史课。曾于1899年入馆学习六年的

张君勱先生在《我的学生时代》中写道,我们那时上课,“四天读英文,三天读国文”,“在四天读英文的时间,并不完全读英文,而是包括了数学、化学、物理、外国历史等都属于英文”<sup>⑩</sup>。由此可见,外国历史课用英文讲习,这和同文馆相同。

湖北自强学堂由张之洞创立于1893年,它也是一所外国语专门学堂,没有单独设置历史课程,这和同文馆、广方言馆不同。但是,所开方言(即各国语言文字,初开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门,后增日文一门)课程的目的“并非欲诸生徒供翻译之用”,而在于“培植志士,察他国之政,通殊方之学,其期共济时艰”<sup>⑪</sup>。因此,方言课程中涉及大量中外历史知识。例如,1899年冬天,自强学堂总考,除五堂汉文各二题外,各堂西语题中,法文堂出法文九题,其中文法二题,第一题默写“欧洲史略各一段”,第二题为翻译,如“译大彼得传略”,“译合众国自主一章”,“译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战纪”等。德文堂出德文九题,其中文法四题,翻译五题,如“译普鲁士自主战争纪一则”等。东文堂出日文十六题,其中文法五题,翻译九题,如“译支那史禹治水一章”,“译苏秦事迹一则”,“译孟尝君事略”,“译日本古书二节”,等等<sup>⑫</sup>。这样,自强学堂的学生既能精晓洋文、多读西书、会通博采,又能“习事于史,详考其治乱得失”<sup>⑬</sup>,可谓一举两得,值得我们今天编写外语课程内容时参考。

第二类,洋务军事学堂,无论是水师学堂还是武备学堂,几乎都兼习历史课程。

江南水师学堂规定,驾驶、管轮两科的学生都要由六位汉文教习分时讲授《春秋左传》、《战国策》、《孙子兵法》、《读史兵略》诸书。广东水陆师学堂水师、陆师两个专业的学生,“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每逢洋教习歇课之日,即令讲习史书,试以策论,俾其通知中国史事军事”<sup>⑭</sup>。可见,《四书》、《五经》和史书已成为水陆师学堂学生的必修课程。此外,湖北武备学堂还设置“各国战史”课,以学习近代军事知识。山西武备学堂所设课程中,涉及历史的计有“史学”、“古代英豪事迹”、“忠孝节义及清朝历年中外交涉战争之事”三门课<sup>⑮</sup>。军事学堂历史课程的设置能使学生“知己知彼”,因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类,洋务科技学堂(如医学、电报、铁路、矿务等)中也有部分学堂设置历史课程。例如,鲁迅先生青年时代就读的南京矿务学堂设有外文、汉文、格致、地学、金石学、算学、历史、体操等,鲁迅先生对这些功课和书籍感到“非常新鲜”<sup>⑯</sup>。

综上所述,按资本主义模式建立起来的洋务学堂几乎都要兼习历史课程。各类学堂的历史课程互不相连、互不统属,没有形成统一的、完整的学校历史课程系统,所有学堂的历史课程都是半新半旧的过渡形式,只能看作近代普通中学历史课程的萌芽,这是其一。其二,设置历史课程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而历史课程分为中国史、外国史两门,中国史大都涉及“中学”中的《四书》、《五经》,伦理道德,学生通过阅读中国史鉴,既能“端其识趣”,又能“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sup>⑰</sup>。外国史课是“西学”的具体体现,通过“诵读外国史书”,使学生广其见闻,看到另一个陌生的世界,导致其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有利于学生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和西方政治军事技术及近代工业知识。其三,由于洋务学堂名为中西兼习,实为有西文而无西学,着重西方语言文字的传授,仅把历史课程附设于语言学堂和其他学堂之中,出现有些学堂未设历史课程却涉及中外历史的现象,说明历史课程在洋务学堂课程中未取得独立地位。

## 二、近代维新学堂的历史课程

19世纪末期,国际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把矛头对准中国,当时中国的形势是强邻日逼,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宣告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正如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所说,日本“伺吉林于东;英自藏三,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sup>28</sup>。面对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封建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拒绝维新守缺,反对革新变法,说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封建顽固派刘毅公开声称:“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sup>29</sup>就是说,他们宁肯让帝国主义瓜分,也不愿让人民稍有安定生活,对于亡国灭种是漠不关心的。这种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当时一部分带有资本主义思想的官吏和上层知识分子的忧国之心。他们要求挽救国家危亡,改革社会,逐渐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最终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即维新变法运动。

在这次进步的政治运动中,办学堂就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推动维新运动的重要手段。据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三年内维新派在全国设立学堂19所<sup>30</sup>。比较著名的有:康有为于1891年——1895年在广州长兴里设立的“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同等于1897年——1898年在长沙主办的“时务学堂”,严复于1894年在北京创办的“通艺学堂”,盛宣怀于1895年在天津创办的中西学堂、1896年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陈芝昌等在广州创办的“时敏学堂”等等。

上述学堂中,都设置了历史课程。例如,万木草堂的办学宗旨在于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以培养维新变法人才。所设课程分为四大学科:文字之学、经世之学、考据学和义理之学,每学科下各设二至五门课程,其中和历史有关的有四门,即经世之学下设的“万国政治沿革得失”、“中国政治沿革得失”;考据学下设的“万国史学”、“中国经学史学”,占全部二十二门课程中的四分之一弱<sup>31</sup>。时务学堂的办学宗旨在于使学生成为具有维新变法的坚强意志,又通晓中外古今的广博知识和治理国家的专门人才。所学课程分为两种,一为溥通学,学生人人皆当通习,下设四门,即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二为专门学,下设三门,即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学生入学第一年,前六个月只学包含中外史志在内的溥通学,后六个月溥通学与专门学并习<sup>32</sup>。历史课程以本国史为基础,兼习西洋史,以求“经世致用”,这便是梁启超所说“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sup>33</sup>。这对于启发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的意志有一定作用,并为维新变法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天津中西学堂中的头等学堂第一年所开七门课程中也有“各国史鉴”课。<sup>34</sup>

这一时期,维新学堂的历史课程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历史同国文、算学、舆地、体育等课并列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列入普通教育,并规定为必修课,为确立近代中国新学制下的历史课程奠定了基础。

第二,历史课程贯穿着以史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得格外的浓烈。这一思想具体表现在历史课程内容特别强调政治史,尤其是各国维新变法史。如长沙时务学堂的中国史教材主要有《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历代职官表》、《全史职官志》、《通考续通考皇朝考职官门》等;外国史教材主要有《万国史记》、《日本国志》、《泰西新史揽要》、《西国政学事物源流》、《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欧洲史略》等<sup>35</sup>。这些历史教材分为专精之书(精读)和涉猎之书(泛读),前者必须终卷,按日分课,不许躐等;后者可随意翻阅。

第三,继洋务学堂之后,在重视中国史课的同时,尤其重视外国史课的设置。如上海南洋公学除国学史地外,还增设“世界史地”课<sup>36</sup>,北京通艺学堂设置断代史——“泰西近史”<sup>37</sup>。外国史课着

重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介绍,目的是了解国际情况,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样,打开了长期闭塞的状态,使学生对世界局势的状况,列强瓜分我国的危险有所了解,唤起他们起来改革,起来救亡。例如,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史学时,讲的是“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sup>⑧</sup>,每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sup>⑨</sup>。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课程已成为维新变法图强的重要的思想武器,历史课程的教育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第四,历史课程与国文课程紧密结合。学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写出许多针贬时弊的史学论文。如长沙时务学堂学生黄颂銮的《读〈后汉书·党锢传〉书后》,《读〈史记·游侠传〉书后》,蔡锷的《秦始皇功罪论》,张伯良的《问美欲认古巴为独立之国有合于公法否》、《〈泰西新史揽要〉书后》等,这些史学论文均在《湘报》上发表,有力地推动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发展,增强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

概而言之,社会发展有其连续性,历史进程是交错发展的,前期尚未结束,后期已在孕育之中;后期已经形成,前期尚有尾声。所以,每一个时期,都含有前一时期的余波与后一时期的萌孽。因此,在课程理论中,往往呈现出相互交架、互相渗透的痕迹。笔者期望,对中国近代洋务学堂和维新学堂历史课程设置的研究能为当今九年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的改革提供一面镜子和一把钥匙。

#### 注释:

①《复刘仲良中丞》,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十五)。

②《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三)。

③《复郭筠仙星使》,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十七)。

④《筹议海防折》、《肄习西学请奖折》,见《李文忠公全集·奏议》(二十四)、(五十三)。

⑤⑥⑦朱有璩《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第203页,第43页。

⑧⑨⑩⑪⑫⑬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第31页,第44页,第58页,第65页,第35页。

⑭中国近代最早的学校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历史课程一改中国只学本国历史课程的弊端,增开一门外国历史课程。这种历史课程结构被中国官办洋务学堂所借鉴,形成有异于教会学校的新历史课程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教会学校的历史课程是中国新式学堂历史课程的胚胎。

⑮⑯同⑤第215页,第221页至222页。

⑰⑱同⑤第221页至222页,第202页。

⑲⑳㉑㉒同⑤第319页,第326页,第516页,第547页至550页,第496页。

㉓陈山榜《张之洞〈劝学篇〉评注》,大连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至63页。

㉔《康有为全集》(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页。

㉕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中国史学会主编,神州国光社出版,第290页。

㉗㉘朱有璩《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238页,第298页。

㉙㉚㉛㉜同㉗第29页,第493页,第300页至第306页,第527页,第715页。

㉝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